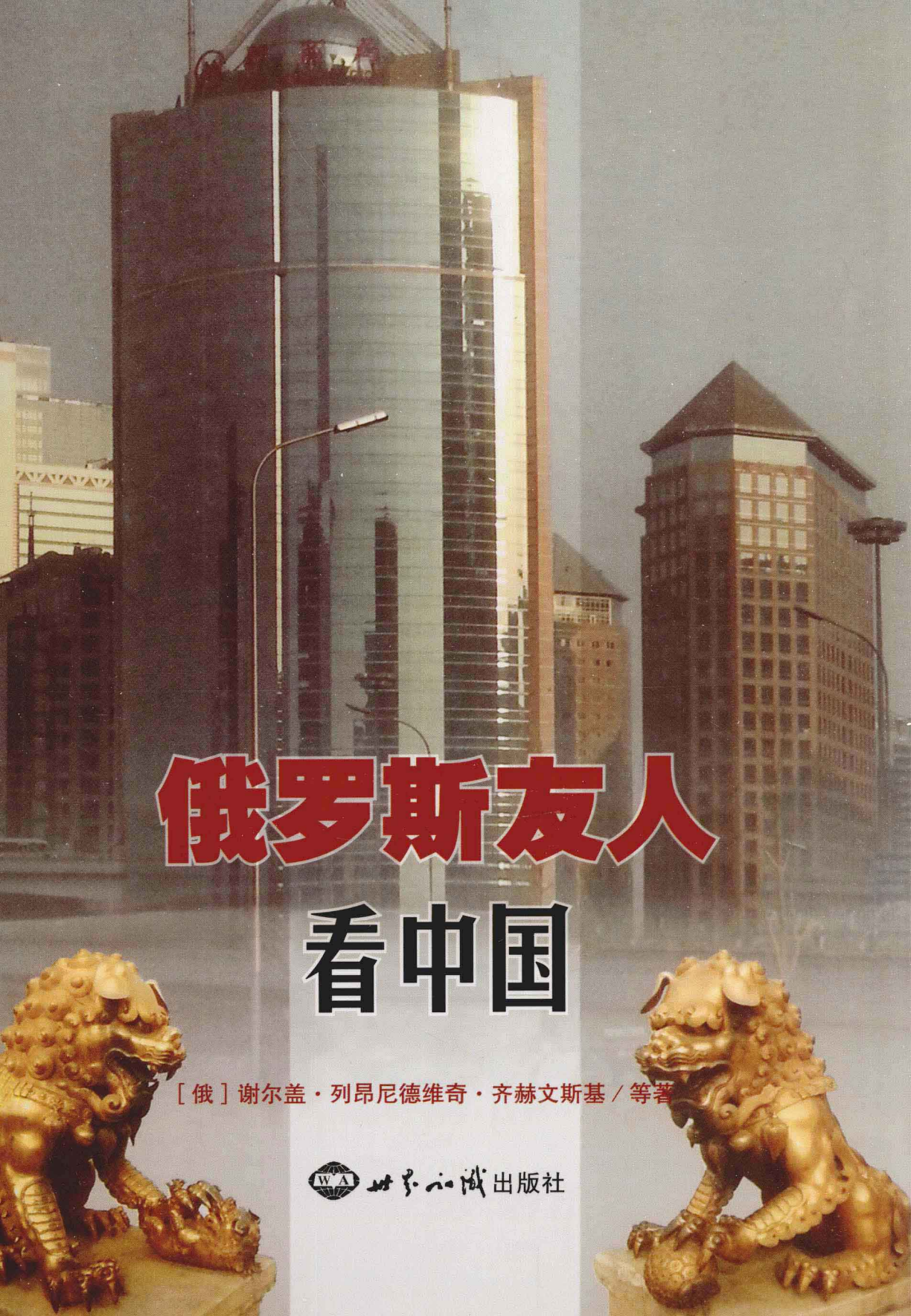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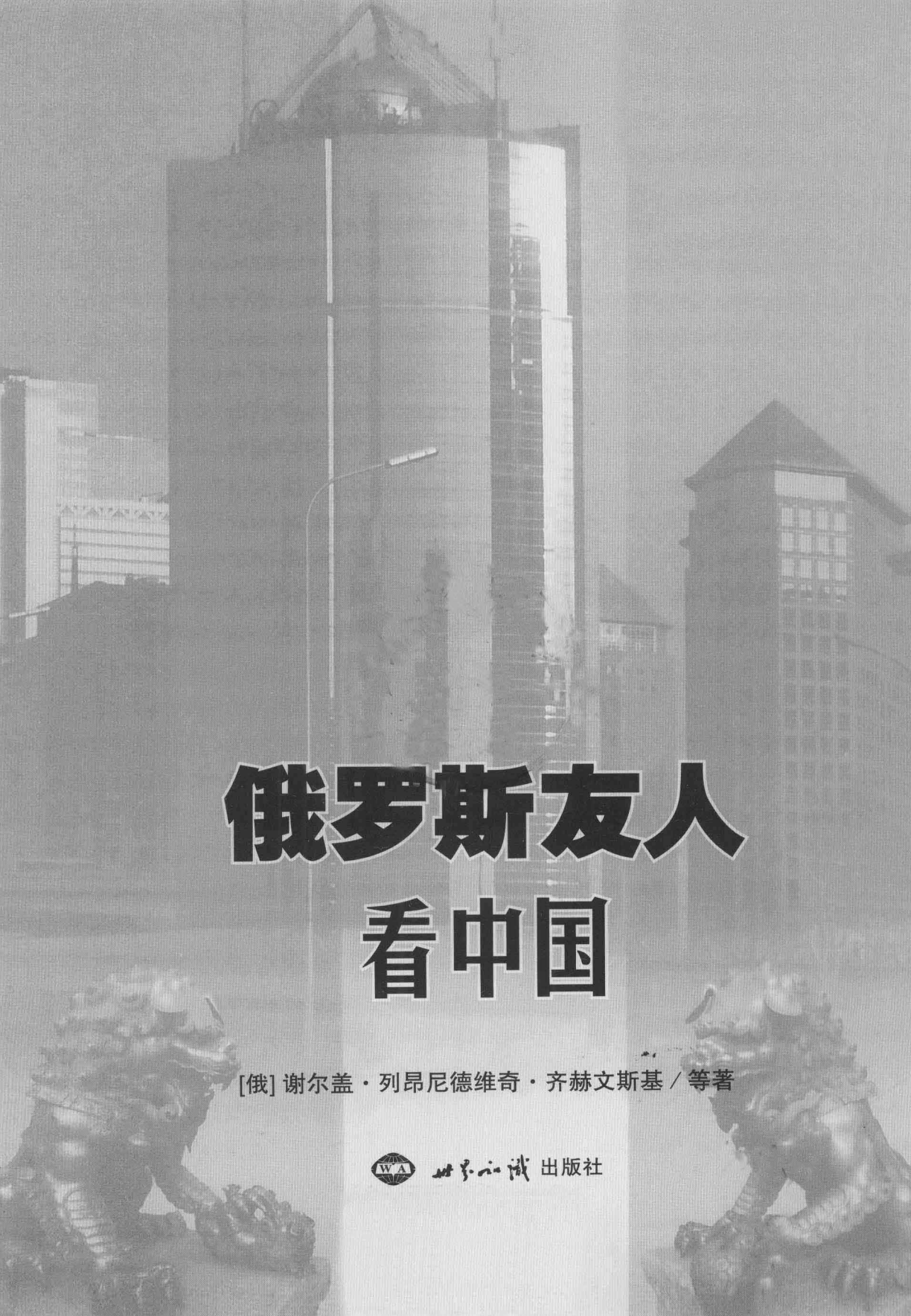




俄罗斯友人 看中国

[俄] 谢尔盖·列昂尼德维奇·齐赫文斯基 / 等著

 世界出版社



俄罗斯友人 看中国

[俄] 谢尔盖·列昂尼德维奇·齐赫文斯基 / 等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俄罗斯友人看中国/ (俄罗斯) 齐赫文斯基等著; 王宗琥, 李玉萍, 邢淑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012-4525-3

I. ①俄… II. ①齐… ②王… ③李… ④邢… III. ①访华观感 IV. ①D609.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97211号

图字: 01-2013-5415号
.....

责任编辑 龚玲琳 姚少春

责任出版 赵 玥

责任校对 陈可望

封面设计 姚少春

书 名 俄罗斯友人看中国

Eluosi Youren Kan Zhongguo

作 者 [俄] 谢尔盖·列昂尼德维奇·齐赫文斯基 等

译 者 王宗琥 李玉萍 邢 淑

审 校 外交部欧亚司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 (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怀柔红螺福利印刷厂

开本印张 787 × 1092毫米 1/16 16印张

字 数 214千字

版次印次 2013年9月第一版 2013年9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4525-3

定 价 10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俄中友好协会主席、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

主编寄语

对于一个研究中国60余年并在俄罗斯传播中国文化的人来说，也许没有比作为本书的主编更让我快意且义不容辞的事情了，因为这本书汇集了各个时期访问过中国的俄罗斯学者、记者、社会活动家、专家们关于中国的文章和回忆。

当然，我不会像一个编辑一样去修改书中作者的稿子，因为他们都是各个领域的大家，其中有俄罗斯著名外交家、中国历史及亚洲国际关系专家齐赫文斯基院士，著名汉学家和外交家、国务活动家、俄罗斯联邦会议上院议员、历史学博士罗高寿，著名记者、中国和日本文化资深专家奥夫钦尼科夫，还有一些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和资深汉学家，例如李福清院士，沃斯克列先斯基教授，经济学博士沙巴林，以及我们资深儒学专家、俄罗斯儒学协会会长、俄罗斯功勋科学活动家、历史学博士佩列洛莫夫教授。书中的其他作者也都是各个领域的权威专家，在此不一一提及。每位作者都有权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去表达观点。

俄中友好协会中央理事会很早就打算出一本俄罗斯友人关于中国的回忆文集。因为在俄罗斯有太多热爱中国的朋友，其中包括为数不多的依然健在的参加过1945年解放中国东北地区的苏联红军老战士，以及20世纪50年代来中国参加工业、科技、教育、文化援建的数千名

苏联专家。

然而，由于经费的原因这个美好的计划一直处于搁浅状态。但是，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好的想法是不会被埋没的。维尔纳茨基院士说得对：好的想法不会被埋没，它们深深地植根于智力层，等待着赏识自己的伯乐。

果不其然，伯乐来了。首任中国驻俄罗斯大使，我国人民的老朋友，同时也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荣誉博士、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理事长的张德广先生在莫斯科访问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时向我建议，希望中俄两国以合作的方式共同出版一本关于中国的书。2011年10月，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于振起受理事长的委托正式提议在莫斯科出版《俄罗斯友人看中国》一书。这一提议得到我们的热烈支持。

于振起先生在提议的同时邀请我担任该书的主编。

我和俄中友好协会中央理事会的同事与助手一起承担起这项工作。一位是协会的第一副会长库里科娃女士，另外两位是协会中央理事会的执行秘书维尔琴科和图尔恰克。我们发出了大量征稿函，并与许多专家进行了电话沟通，最终确定了一个能够按时提交文章的作者名单。

我们收到的文章不论在形式上、内容上还是主题上都可以用一句中国古语来表示，那就是“百花齐放”。至于后半句“百家争鸣”，这种情形在我们的文集里没有出现。所有的作者都对中国人民充满着真挚的感情，赞叹中国的辉煌成就，坚信发展和巩固两国之间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的重大历史意义。当然，那些经历过20世纪50年代苏中关系蜜月期、冷淡期以及60—80年代冲突期的人们在自己的文章中不可能不提到两国关系的艰难岁月，但是当作者们提到这些事情时，并没有谴责某一方的过错，而是从尊重中国朋友、为当代提供警示的角度来表达观点。俄中领导人在签署完历史性的《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之后说过一句至理名言：“世代友好，永不为敌！”这句话对于两国的

后人永远具有指导意义。

书中作者们畅谈了他们对中国的发现、他们的中国之路、他们对伟大的中国文化的理解以及对两国友好合作前景的展望，这些思想和回忆是他们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没有经过统一的规划和梳理。我想，读者们看完以后是会有所触动的。

在我看来，作者们关于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形成与意义的思想具有特殊价值。两国之间的关系从20世纪末到今天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以及共同发展的关系。

借此机会我要向俄中友好协会的热心人士表示感谢，感谢为本书出版提供编辑和技术帮助的我的远东所的几位同事，他们是：经济学副博士乌沙科夫，别里丽娜，加卢什科，休罗娃。

目 录

主编寄语

俄中友好协会主席、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 3

我的中国缘

谢尔盖·列昂尼德维奇·齐赫文斯基..... 2

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的精神支柱和研究中国的必备秘笈

米哈伊尔·列昂季耶维奇·季塔连科..... 10

中国朋友常对我说：“中国是你的第二故乡”

伊戈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罗高寿 19

一个汉学家的自白

弗谢沃洛德·弗拉基米罗维奇·奥夫钦尼科夫..... 32

我与中国学者的交往

鲍里斯·利沃维奇·里夫京（李福清）..... 48

中国——一个特殊的星球

瓦吉姆·伊万诺维奇·沙巴林..... 62

我的第一次访华经历

列昂尼德·谢尔盖耶维奇·佩列洛莫夫..... 75

我汉学生涯中的中国

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沃斯克列先斯基..... 80

《莫斯科—北京》我的中国

阿纳托利·叶夫盖尼耶维奇·卢基扬诺夫..... 99

相伴中国五十年

加琳娜·维尼阿米诺夫娜·库里科娃..... 108

这种关系需要珍视

维克多·伊万诺维奇·特里福诺夫 120

一个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安德烈·尼亚佐维奇·卡尔涅耶夫 128

文学才是我们友谊的精神基础

奥列格·米特洛法诺维奇·巴维金 139

我的中国印象

娜塔丽亚·列昂尼多夫娜·玛玛耶娃 156

上海巨变

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娃·戈尔布诺娃 164

铜仁——贵州的大门

维克多·拉甫连季耶维奇·拉林 171

三次中国行

安德烈·谢尔盖耶维奇·克鲁申斯基 192

北京学习往事

亚力山大·格奥尔吉耶维奇·拉林 210

希望与改革时代的中国

弗拉基米罗维奇·罗曼诺夫·亚力山大 221

边境合作背景下的中国

安德烈·弗拉基米罗维奇·马卡罗夫

塔季扬娜·列昂尼多夫娜·古鲁廖娃 230



谢尔盖·列昂尼德维奇·齐赫文斯基

1918年9月1日生于彼得格勒。

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语言系中文科、莫斯科东方大学。自1939年在外交人民委员会（苏联外交部）工作。参加过伟大的卫国战争，被授予12枚勋章及奖章。从一个普通的翻译一直干到特命全权大使。1958年任苏联外交部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东方国家史教研室主任、教授，后任外交学院院长、外交学院荣誉博士。曾在中国、日本、英国及联合国大会任职，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委员会成员。1968—1974年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多卷本《人类史》国际编委会成员，担任第七卷责编。俄罗斯联邦功勋外交工作者，历史学博士，俄罗斯科学院院士（1981年）。著有9部专著和600多篇文章，内容涉及中国历史、日本历史、苏联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1988—2000年任《近现代史》杂志主编，是多卷本《俄中关系史：文件和资料》的发起者和责编。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保加利亚科学院院士，佛罗伦萨美术学院院士，苏联国家奖获得者，俄罗斯“凯旋奖”人文科学奖获得者（2001年）。

目前担任俄罗斯科学院主席团顾问，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谢·列·齐赫文斯基

我的中国缘

我非常尊敬的前任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德广先生给我出了一个难题——让我用短短几页的篇幅来讲述我对中国的印象以及我与中国的单位和个人的接触。

我与中国的间接接触始于1935年9月1日，那年我考入了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中国语文科，师从著名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院士。升入五年级之后我被分配到莫斯科工作，在外交人民委员会当翻译，1939年秋被派往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实习，一直待到1940年。1943年又被派往战时首都重庆，在我国使馆当二秘。刚到任不久，时任大使帕纽什金先生就带我去参加了一个四川银行家举办的宴会。在宴会上我结识了著名作家、诗人和历史学家郭沫若及前中国驻莫斯科大使、左翼国民党成员邵力子。他们二人在席间就给我起了一个中文名字——齐赫文。后来中国人都用这个名称呼我。

在重庆我了解了一些中苏文化协会的活动。重庆居民居住条件差，人口稠密，物价高，通货膨胀持续，电和热水供应不足。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战时首都的社会生活却相当活跃。大家都比较关注中苏文化联络协会举办的活动，当时领导协会的是孙中山博士的儿子、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而协会的日常活动由两位秘书来具体负责，他们是俄语专家张西曼教授和曹靖华教授。曹靖华当时一边教使馆工

作人员汉语，一边将一些俄文书籍和文章翻译成汉语。协会在让中国人了解苏德前线的战况、了解苏联人的生活以及苏联文学、艺术和文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其中包括举办苏联电影展，发布苏联情报局关于抗击法西斯德国的战况通报，庆祝苏联人民文化生活中值得纪念的事件等等。在重庆期间我还结识了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教授，他为我搜集材料撰写孙逸仙对外政策的副博士论文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建议。

后来，使馆通过外交邮件从莫斯科收到苏德前线战况及苏联人民劳动功勋图片展的照片，使馆便派我带着这些照片到兰州和西安等地巡回展出。与国民党的严格审查不同，参观者在意见册中表达了对苏联人民战斗及劳动功勋的钦佩之情，同时也希望苏联能够尽快加入中国的抗日战争，早日击溃妄图通过军事手段迫使中国投降的日本军国主义。

1945年春天由于家庭原因我被迫返回莫斯科。我利用这一机会完成了副博士论文《孙逸仙的外交思想及实践》的答辩。1945年郭沫若到莫斯科参加苏联科学院220周年庆典活动，我奉命陪同他到列宁格勒参加科学院纪念活动的闭幕式。刚刚经历了围困和浴血奋战的列宁格勒以其白夜、涅瓦河以及各种宫殿给郭沫若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在斯莫尔尼宫举办的招待会上发了言，会见了列宁格勒的汉学家，还和我一起去了我父亲家。回莫斯科后他在莫斯科大学历史系作了几个讲座，会见了许多作家，去了索契和其他一些城市。郭沫若将自己的首次苏联之行写进了著名的《苏联纪行》，这本书后来被塔斯社上海分社的社长、著名汉学家罗果夫翻译成俄文。

日本投降后我被任命为苏联使馆驻华北区代表。抗日战争之前在华北地区行使职能的是苏联驻北平和天津总领事馆，该地区居住着许多苏联公民和俄罗斯侨民。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关于恢复俄罗斯帝国臣民苏联国籍的命令之后，许多俄侨开始来使馆领取苏联护照。

1946年初在北平成立了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人组成的联

合委员会，即所谓的军调处执行部，其任务是调节国共两党在以前日本军队占领地区的军事和民事冲突。中方代表团团长是叶剑英将军，我与他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关系。后来与我关系处得很好的还有老北平知识界的代表、北平市长何思源和他的法国妻子，北京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及其继任者、中国著名哲学家任继愈，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及其丈夫罗昌——前北京共和政府驻美国外交官，还有两个医生林巧稚和诸福棠。

在我的新朋友当中有一些北京高校的教授。他们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北平被日本人占领的1937年疏散到后方。清华大学的教授中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一批具有爱国主义情操的老师，特别是历史学家吴晗，他关于明朝历史的研究成为该领域的奠基之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当上了北京市副市长。我与他也有着很深的交情。

进驻北平的国民党军队对在敌占区生活了七年的当地居民不太信任，他们不仅抢占日本人的财产，而且还抢占那些在战争期间没有疏散到后方的当地富人的财产，毫无根据地指控他们和日本人合作。

北平的市民们对国民党当局十分不满，他们热切盼望解放军在国内战争中夺取胜利。当解放军部队在辽沈战役后转战华北并在平津战役中夺取了天津包围了北平的时候，北平市市民在被解放军部队围困四十多天的情况下始终表现出对中国共产党的好感，而且积极配合傅作义将军的北平卫戍部队和平起义。

1949年1月31日解放军部队在市民的锣鼓声和欢呼声中进驻北平。我所熟识的叶剑英将军被任命为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在他的帮助下，归还当地几个苏联公民被国民党抢去的奶牛场过冬饲料，另外有几个苏联公民被国民党掠去的财产也得到了归还。

1949年3月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从西柏坡搬到了北平。不久，一些反对国民党的著名政治活动家以及由于国民党追捕而被迫移居香港和国外的左翼知识分子纷纷回到北京。各种民主团体、工会组织、青年协会和作家协会都恢复了活动。

6月的一天晚上，我应邀去毛泽东的双清别墅（位于北平郊外西山的官邸）参加宴会。在这次宴会上我认识了正准备去莫斯科的刘少奇。此前我作为北平总领事已经执行过几次莫斯科下达的任务，拜访过主管外交问题的周恩来。这顿饭吃得十分轻松愉快，席间周恩来详细地讲述了英国护卫巡洋舰“紫石英号”事件。这艘军舰闯入解放军攻击国民党军队的区域，由于船上煤炭不足而无法从华中地区返回上海。

除了毛泽东和我之外，所有参加宴会的人员都转到了宴会长条桌的另一端，准备筛选刘少奇莫斯科之行的会谈材料（参加宴会的还有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代表科瓦列夫先生，他是苏联前铁道交通部部长，也参与了会谈文件的挑选并将陪同刘少奇前往莫斯科）。这样就剩我和毛泽东坐在了一起。

我在自己的回忆录（五卷本的作品选集）中详细讲述了这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会面。后来我还多次见过毛泽东：一次是在我国大使罗申向他递交国书的时候；一次是在1949年11月7日苏联大使馆的招待会上；一次是1949年12月毛泽东从北京经过中国东北到苏中边境的途中；还有一次是在北京火车站迎接他从莫斯科回京。在我看来，毛泽东毫无疑问是一个能够掌控国内局势的民族领袖，杰出的国务活动家，熟知中国历史和哲学的智者，一个在周围人当中享有绝对威信的领导。同时我也觉得，他并不太关注国内政治和国际局势的个别小细节，而是全权交由周恩来或刘少奇处理问题。

在我和中共领导人单独坐在一起的时候，我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咨询一下他对一些历史人物的看法，这些人物在我的副博士论文中曾涉及过：孙逸仙、严复、康有为等人，还有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所有这些问题毛泽东都给我作了详尽的答复。由于桌子另一端一直在进行刘少奇赴莫斯科的文件筛选工作，所以我决定再问问毛泽东对于汉字前景的看法，它是否会被拉丁文字所替换（提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举了30年代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进行的汉语拉丁化的试

验，这是一场由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院士和中国学者瞿秋白、吴玉章发起的试验)。毛泽东回答说，他知道这些将中国象形文字改为欧洲文字的试验，在日本也有类似的试验，但他反对将中国文字改为拉丁字母，因为那将使中国人无法了解自己几千年的历史，因为这一历史恰恰反映在象形文字中。

我有幸见证了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性时刻。我站在观礼台的下方，观礼台上站着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们，还有一些进入中央人民政府的民主派领袖。大典结束后不久周恩来的助手韩叙（后来做了中国驻美大使）来到总领馆，交给我一封周恩来写给莫斯科的信，信中向苏联通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情况，并希望苏联对新政权给予承认。我立即将信译成俄文并发急电给莫斯科，第二天苏联就宣布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10月2日我被任命为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代办，直到苏联大使抵达北京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递交了国书，之后我被任命为参赞。作为参赞，我常常与中国知识界的代表们接触，比如历史学家翦伯赞教授、侯外庐教授，还有俄罗斯古典文学的著名翻译戈宝权先生。戈宝权1949年夏天正好在莫斯科，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后他立即被任命为中国驻苏联临时代办，直到新中国首任大使王稼祥到任。

在我后来的中国之行中我曾经拜访过戈宝权在南京的居所，并认识了他的妻子。戈宝权是俄罗斯忠实而真诚的朋友，他在向中国传播俄苏文学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戈宝权在抗日战争时期加入了中国爱国主义青年小组，这是一个亲中共的小组，1937年在南京活动，而后追随周恩来到汉口，完成他交给的与外交使团联络的任务，为中国共产党争取利益，维护统一抗日阵线。

1950年5月，我应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革命运动先驱吴玉章的请求为学校外交专业的学生做了几次关于国际法的讲座，之后我就返回

了莫斯科。后来我又多次访问中国，主要是因为两类机缘：一类是以科学院学者的身份参加各类有关中国历史的学术会议；第二类是作为苏中友好协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受到中国对外友协的邀请。我到过中国不少历史名城，比如广州、贵州、陕西、四川。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对延安的访问，我亲眼看到了中国政府和当地政府对青年人和中年人进行革命历史教育的极大热情。我在郑州参观一个新落成的高层历史博物馆时遇到了一群军校学员，我注意到他们饶有兴趣地了解博物馆中的展品，在笔记本上认真地记录着所见所闻。

我的中国之行也使我与许多中国历史学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首先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先驱刘大年教授。在苏中关系交恶的那段时间，我和刘大年有过辩论，但是我们的辩论仅限于对某些具体文献的阐释，并不具有武断的、意识形态的性质。刘大年介绍我认识了研究所的副所长张海鹏教授，张副所长除了在专业上有精深的造诣外还具有很强的组织能力，他成功地举办了一系列中国各历史时期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我撰写学术论文的时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金冲及教授给予我很大的帮助，他写了很多关于纪实文献的文章。刘大年是俄罗斯科学院的外籍院士，他去世后时任中国史学会会长的金冲及教授接替他成为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

我和北京国家图书馆的馆长、著名哲学家任继愈先生也保持着很好的关系。与他的前任袁同礼先生则认识得更早，还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1945年末，那时我刚到北平。袁同礼30年代曾到过苏联，他在国图创立了俄语部，深受读者的欢迎。

我的中国史学家朋友中有著名的清史专家戴逸教授。他是公认的清史研究权威，清朝统治史的主要阐释者，发表了大量关于满清统治的文献。2000年我有幸在斯德哥尔摩国际史学大会上聆听过戴逸教授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将康熙、乾隆与同时代的印度、土耳其和伊朗的国王们做了比较，引起了与会人员的极大兴趣。

在近年来访问中国的过程中我发现，中国许多地方都在积极修复被文革损坏的历史文物，包括孔子的故乡曲阜。在2007年北京国际史学大会的全体会议上，张海鹏教授向与会代表介绍了得到中国政府批准的关于考古和搜集县、乡一级清朝文献用于研究和出版的宏大计划，所有这些工作都得到了中国政府的财政支持。

朱佳木领衔的当代中国研究所对新中国60年历史进行了大量研究。该所与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在许多项目上有着密切合作。

每次访问北京的时候，我都要找机会拜访一下曹靖华教授。1944年我刚到苏联驻重庆使馆时他在那里教使馆工作人员汉语，对我的汉语提高给予了很大帮助。那时候曹靖华经常生病，我每次都是去医院看望他，因此也结识了他的女儿曹苏玲。曹苏玲是父亲忠实的助手，父亲死后她出版了曹靖华的系列书稿，其中包括10卷本的著作及翻译文集。

关于我生活上的朋友我想提两位医生，他们是林巧稚和诸福棠，他们对我的妻子和两个在北平出生的孩子都给予了无微不至的照顾。

我最近一次访问中国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庆典期间。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参加这一庆典的激动心情。中国展示了自己在经济、文化、体育等领域取得的成就，同时也展示了自己的军事实力。天安门城楼上的嘉宾与北京市民一起隆重庆祝了人民革命的纪念日，他们对自己取得的成绩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感到无比自豪。

在文章的最后，我想强调一下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与中俄友好协会在巩固两国人民友好关系方面所做的巨大贡献。近年来领导这两个组织的是一位天才的戏剧家、诗人和戏剧活动家——陈毅元帅的儿子陈昊苏。在他的努力下中俄之间的文化交往日益繁荣，各种交流活动及参加人数都越来越多。在这里还需要指出陈昊苏的几位前任，他们是王炳南、伍修权、张文清、屈武等人，他们都为中俄友好往来做出过自己的贡献。中国对外友协东欧部是一个团结的集体，他们认真地准备每一次与两国文化交流相关的活动。在此我想对他们每个人都表达我深深的敬意。



米哈伊尔·列昂季耶维奇·季塔连科

1934年4月27日生于布良斯克州拉科玛雅布达镇。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俄中友好协会会长，俄中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俄方主席团成员，俄罗斯联邦功勋科学活动家，国家奖获得者（2011年），哲学博士，教授，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中国、越南、朝鲜和古巴等多家科学院和大学的名誉教授。